

救的力量」；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我們也期許：哪裡有無家可歸的感慨，哪裡就開啓回家的路。（2001年2月12日收件，作者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家的認同與意義重建：魯凱族好茶的案例〉一文作者）

## 如何回家？

畢恆達

連續接獲六篇對於「家的意義」專題的回應文章，細讀之後，深受感動。在沒有論文審查費、沒有稿費、不計算學術出版點數的情況下，他們卻都很真誠嚴肅的閱讀論文、撰寫回應文，而不是隨意交差了事。這樣一來一回的觀念互動，確實有助於作者一再反省自己所身處的學術脈絡、隱而未顯的觀點、甚至淺藏的情緒與感受，以及這些與學術研究寫作之間的關聯；讀者也因此可以有更為多重的閱讀角度。無論作者與回應人都處在不同的視域，透過真誠的互動，可以讓每個人的視域得到具體的開展。

「家的意義」的四篇論文都屬於田野研究，除了田野觀察之外，主要分析的資料為訪談的對話內容。誠如余德慧在回應文中所言：「有必要探討田野工作法如何獲得心理學知識的問題」（頁16）。他同時指出，傳統心理學的方法論大都採取去脈絡的分類編碼方法，無法滿足心理學理論的要求。的確，以目前國人所熟知的三個質性研究的派別：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自然論（naturalistic inquiry）、現象學（phenomenology）<sup>(6)</sup>而言，其質性資料分析的方法，大都集中在意義單元的辨識與分類上面，正如余文所指出，這種去脈絡化的類別範疇分析，在方法與現象的理論化之間有個斷層。同樣的，我（畢恆達，1993）也曾從 Dewey 的交互論（transactionalism）觀點，檢視環境心理學界對於物的意義的經驗研究，發現使用一個無法與理論契合的研究方法，導致研究者以替物體意義貼標籤來取代對於物如何取得意義之過程的分析。同時，Addison（1989）也援引 Gadamer 的詮釋學觀點，指出研究不只是對於外在世界知識的增加，也應該同時檢視研究者自身的先前理解，亦即研究不只是在白紙上加了一些圖案而已，它讓我們反省自己原來是這樣看世界的。Boesch（1991）也曾指出，一個嚴肅的異文化體驗必然也牽涉一個

自我分析的過程。我們可以從身體、社會性別到文化的層次來說明這個過程。

當我們嘗試理解盲人的經驗時，我們不只是發現盲人「可以聽到雨打在和鄰居相隔的籬笆上。前方小徑和台階的輪廓也隱約可見...雨打在混凝土上，打在淺坑上，激起水花...到處都是圖案、障礙物、投影的小改變...背景溫柔的雨聲，集成雨連續的低語，就像燈光打在一幅美景上。」(Hull, 2000: 54)「當我來到街區的盡頭時，自己通常都會知道。這是因為空氣的流動，在街角感覺到的微風。」(Hull, 2000: 49)我們同時發現當走進屋子時，我們觀察屋子，而盲人則觀察自己的身體。我們也發現我們是如此地倚賴視覺，從衣服與旌旗的飄揚中「看」到風，而忽略了風吹拂身體的感覺、忽略風吹過樹葉的聲音。我們用眼睛觀看教堂的雄偉，卻略過了岩石的紋理與溫度。

婦女研究不只是讓我們瞭解女性的經驗，同時也發現原來我們篤信不疑的觀念是如此的父權；而同志研究，不只是讓我們知道了同性戀者的生活處境，更照見了自己的想法竟是如此的異性戀。當社會大眾說：「我可以接受同性戀，只要他們是關起門來自己搞。」我們本來以為公共空間是一個去性或無性的空間，可是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重複表演與行為規範，卻發現公共空間其實是異性戀空間。異性戀伴侶在街道上的牽手與擁抱、電影看板上充斥的偉大異性戀愛情、超級市場與櫥窗不斷傳達的核心家庭觀念、商店與公園中流動的男女情歌對唱、茶館嗑牙所說的黃色笑話、見面寒暄「什麼時候請我們喝喜酒啊？」的例行問話，都在告訴我們公共空間中什麼是合宜的（異性戀）行為舉止。

在大陸四川省出土的三星堆遺址，之所以成為傳奇，除了器物的藝術與技術價值之外，更因為它戳破了我們長期堅信不移的文化起源觀點：黃河流域為中華文明的主要發源地。所以在讚嘆三星堆傳奇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反省為甚麼我們始終相信中華文明的單一起源觀，而唯一的起源是黃河流域。同樣的，在認識澳大利亞人後，我們好奇的不只是他們怎麼會在耶誕節到海邊滑水，而是為甚麼我們腦中所浮現的耶誕節畫面總是白雪紛飛、穿著厚重大衣的耶誕老人的畫面，這是怎樣的北半球的觀點啊。

放到一個學術研究的脈絡，我們如何能夠做到反省自己的先前理解呢？哲學詮釋學雖然指出自然科學方法也是詮釋的，它也離不開先前理解，它只是符合人類技術旨趣的一種探究方法；但是期望在哲學詮釋學中，找到隨手

可用的具體社會科學方法的人，注定是要失望的（殷鼎，1990）。然而由於對於人類理解本質的認識，詮釋學雖然並沒有對應到一特定的研究方法，但是它對於傳統的方法以及經驗研究的哲學預設卻有了新的觀點。Kockelmans（1975）的努力就在於企圖連結詮釋學與社會科學。他認為詮釋學取向的社會科學，其目的在於理解社會現象的社會意義，此意義並非存在於個人私密的領域，既非傳統自然科學所說的客觀，也不是主觀的意義，而是為社會成員所互為主體共享的意義，因而研究者也有可以達成理解的進路。他舉出五個社會科學研究操作的準則：

1.現象的自主性（autonomy）：詮釋者必須從現象本身來進行理解，而不能由外強加意義到現象之上，現象是理解正當性的主要來源與判準。

2.詮釋者必須尋找最合理（maximally reasonable），也就是人性（human）的詮釋。

3.詮釋者應讓自己進入一個與現象維持和諧關係，以達最可能的熟悉性。

4.進入詮釋的循環。此循環包含四個層次：（1）理解做為整體的研究現象與其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2）此特定現象（部分）與其所有相關現象（整體）之間的關係。（3）涉入此現象的社會行動者（部分）與其生活世界（整體）的關係。（4）西方文明（整體）與在社會行動者世界中所呈現的現象（部分）之間的關係。

5.在上述的詮釋過程中，詮釋者必須闡明此現象對其自身處境的意義。這樣的詮釋過程隱含詮釋者必須熟悉研究對象的傳統，而真正的理解就發生在研究者與詮釋對象彼此視域的融合。隨著詮釋循環，研究者不斷地反省與修正先前判斷（pre-judgment）或先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結果對於社會現象的理解卻指向了自我的理解。

任何操作的研究方法都只是研究進行的基礎，卻無法保證研究成果的品質。一個實際的研究運作過程，除了方法的遵循、研究對象相關理論（target knowledge）的熟悉之外，其實也還關乎研究者背景知識（background knowledge）的多寡。而在研究過程當中，我們比較容易處理研究田野中的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可是要反省研究者自身的先前理解卻是比較困難的事情。詮釋學取向的社會科學認為研究者不再是一個客觀、置身事外的觀察者，她自身就是研究的工具。這幾年來我也一直鼓勵研究生盡可能地把自己的研究



歷程翔實地在研究方法的章節中描述，不過論文的口試委員卻經常建議學生把這些描述放到附錄中。我想原因有幾個：在既有的學術論文寫作中，沒有太多的範本可以參考學習；研究者比較容易書寫研究過程中與研究對象的互動關係、自身的成長背景與情緒等，但是如何將這些資料與理論的推演做一緊密的連結就較為困難。所以較常看見的結果是：這些研究歷程的討論對於研究方法有所貢獻，但是對於論文中研究發現與推論的連結就不夠強。我（畢恆達，1995）曾經以物的意義的研究歷程來說明研究理論預設以及詮釋循環的操作。現在再以〈從環境災害過程中探索家的意義〉（畢恆達，2000）的研究過程中的幾個實例，來說明制式的研究方法背後所發生的真實過程。

在一般的論文研究或寫作中，研究者必須回顧與研究現象相關的理論或經驗研究，而論文寫作的文獻回顧章節中只需引用直接有關，且能據以導引出研究發問的文獻，它並不是一個讀書報告。不過在真實的研究過程中，除了所謂的相關理論之外，研究者的背景知識也扮演一個不能忽略的角色。例如，社會大眾如果經歷幾次民生別墅或林肯大郡的協調會或公聽會，會聽到居民重複敘說的經驗或訴求。有的人會有直覺的反應：「這不是已經說過了嗎？」「她們為甚麼那麼激動？」覺得居民情緒化的表達一定不夠客觀。我在進行田野研究的時候，同時也在做關於建築專業中的女性經驗的研究。女性的經驗讓我對於環境災害的田野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

說來話長，我在就讀台大土木研究所的時候，曾經閱讀過《向拉斯維加斯學習（*Learning from Las Vegas*）》這本書，我印象中的作者就只說得出范裘利（Robert Venturi）一個人的名字。前幾年開授「性別與環境」課程，讀到 Denise Scott Brown（1989）關於建築明星制度的文章，以及《愛因斯坦的太太》（Gabor，1997）這書的中譯本時，才知道《向拉斯維加斯學習》背後的性別故事。原來這本書的寫作基礎是「拉斯維加斯研究計畫」，而計畫的主要構想來自於 Denise。共同作者 Izenour 表示這項計畫之所以能夠如此精密嚴謹，主要要歸功於 Denise，而范裘利（Denise 的先生，後現代主義建築師）也承認 Denise 以一個來自南非的旁觀者身份幫助他用全新的角度來觀看美國的建築景觀（Gabor，1997）。書籍完成之後，范裘利建議將 Denise 列為第一作者，但是出版該書的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The MIT Press）卻堅持將知名度較高的范裘利放在首位。書籍出版之後，建築評論界幾乎都將此書的成就

歸給范裘利，而沒有提到 Denise。他們雖然一一去函指正，但是並沒有評論者接受。除此之外，在社交場合中，她被視為是建築師的太太（有一個建築師聚會甚至不邀請她，因為他們不歡迎眷屬），或受到建築書籍與團體有意的忽視與排斥。她雖然是建築師事務所的合夥人（與她的先生等），別人卻認為她是「老闆娘」。而她所發現的「鴨子」也被稱為是「范裘利的鴨子」（Venturi's Duck）（鴨子造型的建築物）。這些經驗讓她必須不停的戰鬥、為懷疑與困惑所苦、同時為此花掉太多的力氣。然而一位設計師女性朋友告訴她：「如果將我的工作成果歸因於我的先生，我會感到很快樂。」同事也說：「你幹嘛為這些事情而操心？我們瞭解你的能力，知道你在公司與教學上所扮演的真正角色，這樣還不夠嗎？」她因得不到應有的專業界與社會認可而抱怨，而抱怨又更惹來建築評論家的敵意，結果她對於自己的充滿敵意的個性也感到不喜歡。她開始對自我產生懷疑（Brown, 1989），一直到後來認識其他女性主義者，才讓她重新認識自己與性別結構問題。這是許多女人共有的經驗，其工作能力無法受到肯定，因而產生的抱怨也無法得到認真的看待，結果女人懷疑的是自己。是自己真的能力不足嗎？是自己氣量太狹小嗎？

Denise 的故事雖然傳達的是性別歧視的經驗，但是卻有助於我去理解林肯大郡居民在抗爭過程中那種無奈的心情。我參加過幾次針對林肯大郡善後處理的立法院公聽會以及政府協調會，幾張熟悉的面孔、講著已經聽過許多次的經驗與訴求，一般人可能會覺得不耐煩，然而這就是事實。居民與各級政府已經開過上百次的協調會，但是與會的政府官員總是說他們有極大的誠意，結論卻是回去研究研究，然後就無聲無息，等下次會議的時候，一切又要從頭開始。說過的話得不到回應，一而再再而三，能夠沒有情緒嗎？如果又聽到有人說：「林肯大郡的事情不是已經解決了嗎？他們還要爭甚麼？」居民更是有苦向誰訴？就像 Denise 的糾正與抱怨得不到建築評論家的回應，而她的朋友還質疑她為何生氣。

Mishler (1986) 認為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受訪者並不是將已經存在腦中的記憶如實地呈現，而是用一種他認為訪員可以理解的、敘說故事的方式，去重構他的經驗和歷史。受訪者與訪員的先前理解，在敘說與問答的過程中得到溝通與反省，以共同創建一個彼此都能夠理解的資料。所以訪談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它不是將在訪談之

前就已經存在的客觀事實挖掘出來，而是不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

記得我在做性別意識形成歷程之研究的時候，曾經訪問一位男性工程師，他告訴我他因為不抽煙喝酒，所以別人認為他不像男人，他因此開始反思性別的概念。我是事後聽訪談錄音帶的時候，發現我一直不滿意他給我的答案，始終認為一定還有其他更為重要的原因他沒有說出來，所以不停地追問他。我想是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不抽煙不喝酒的男人，可是我從來不曾因此而受到同儕的壓力，也沒有人會因此說我不像男人。但是為甚麼當男性受訪者跟我說，他喜歡塗指甲油、不想聽父母的話去學醫、他娘娘腔，我就很容易接受他的回答？於是我開始反思我自身的經驗與理論背景，如何影響我詮釋受訪者的回答是否是一個滿意的答案。這時候，喝酒這件事就從我的即手存有（ready to hand）轉變成為眼前存有（present at hand），也就是說喝酒從我的生活轉變成為我觀看反思的對象。我開始觀察喝酒情境，也從許多勸酒的話語（如，「連酒都不會喝，還想娶我的女兒？」）以及互動（「你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中，發現其與性別/男性氣概的直接連結。

而在研究環境災害的過程中，曾經與一位因九二一地震而房屋受損的女性教師有過很長的談話。她起先跟我提起有人要找她做為地震研究的研究對象，她覺得很不舒服，又強調她不是災民。她說看到電視關於地震的報導，覺得好像都是在講她，但她絕不希望她是那個在鏡頭面前訴說悲慘處境的人。我問說，她自己也是學術工作者，也研究別人，為甚麼會對於成為研究對象感到那麼不舒服？她說不清楚。我問她，如果我在進行一項女性教師的教學經驗研究，找她訪談，她會不會覺得很不舒服？她說不會，因為做為一名女性或女性教師，她覺得自己是專家，可以很清楚的表達、回答問題，可以侃侃而談；可是做為環境災害的研究對象，她是一個很易受傷（vulnerable）的災民，因為她連有做惡夢還是都沒有做惡夢、到底是好還是壞、是不是心理有問題都不知道。在接下來的對話中，她又說了關於個人獨特性、自信、比慘等經驗。她的經驗陳述並不是在對話之先已經有答案在那裡等待發現，而是經由相互理解、發問的過程，建構出一個新的理解出來。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出現的情緒，經由反省之後，也都是深化知識的來源。一位研究助理在長時間參與林肯大郡的田野調查後，有一天在家樂福遇見一位他所熟識的居民，見她愉快的推著車子採購，他嚇了一跳、一時無法

接受他所看到的現實。他覺得不是還在抗爭的過程當中嗎，怎麼會有心情來大採購？一位記者也曾告訴我，她有一次遇見一位林肯大郡的居民，見她濃妝豔抹，就很不能接受災民怎麼還有心情化妝。隨後他們馬上警覺到自己的情緒反應所展現的偏差概念。過去他們在田野所接觸的居民，大都是一群人擠在地下室愁眉苦臉地討論抗爭的對策，媒體上看到的也是痛苦含淚的控訴。也就是我們有一種沒有說出的災民固定形象。研究者若沒有自我反省，尚且如此，一般社會大眾就更加難以避免了。以致於當居民情緒化地哭訴時，大眾覺得不耐煩；可是當居民呈現快樂形象的時候，大眾可能又覺得那你過得很好嘛，那還有甚麼好抗爭的？就像一位受訪者所說，地震過後，她租了一間房子並且整理得非常漂亮，沒想到朋友竟然質疑她，不是災民嗎，怎麼還過得那麼奢侈。但是她問：「難道因為我是災民，我就沒有把生活過得好的權利了嗎？」

除了環境災害之外，對於女性遊民、男同志這些社會邊緣的族群的學術研究的意義何在？夏林清的回應文提到研究行動即社會行動；王明智的回應文則提出運動策略的轉換與運動者的智慧。我想很多研究者都深刻體認到學術研究往往對於其直接研究對象的處境改善無能為力，研究者無法替居民爭取到政府的賠償、無法解決父親對於女兒的行動控制、無法讓研究對象脫離貧窮的處境，因此研究者不如誠實面對這樣的可能性，不要對研究對象做不實的承諾。除了學術領域中理論的提出與創新之外，雖然一個研究無法直接影響資源的投入與政策的改變，但是仍然可能對於田野造成直接與間接的影響。首先，研究本身可能讓研究對象找到抒發感情與意見的機會。十幾年前我做留學生的研究，一位受訪者就非常高興我找他訪談。他說他媽媽雖然很關心他留學的事情，但總是問他紐約的天氣、住宿、錢等問題，沒有人真正有機會讓他說出他留學所懷抱的遠大理想。另一個有關婦女住宅空間體驗的研究，一位婦女在我訪問的前一晚，整夜沒睡，把她成長的一生重新回顧一次。另一位受訪者將我們所整理出來的訪談逐字稿拿給她兒子，她覺得這是最好的禮物，可以讓她的兒子知道她是怎麼活到今天的。因此研究本身，可能讓受訪者有機會發抒自身的感情，同時增進對於自身的理解。研究也可能改變社會對於其所不熟悉的族群生活的偏見，進而有助於彼此的瞭解，甚而能夠形成輿論，以改善研究對象的實質處境。當然有些研究也可能影響政策

與法令制度，例如基於廁所研究基礎而發動的新女廁運動，改變了建築技術規則關於公共建築物中女廁數量的規定。我從事的民生別墅研究（畢恆達、郭一勤，1999），在論文正式發表之前，經由報紙媒體的文章報導，幫助社會大眾瞭解受輻射災害居民的生活處境。而意外地，我的研究報告成爲一審法官判定國家賠償中精神賠償部分成立的依據之一。（不過弔詭的是，政府單位也以我的研究報告中並沒有受害者真實姓名而認爲不可採信。）

王明智的回應文認爲〈男同志同居伴侶的住宅空間體驗：四個個案〉一文採取以男同志爲主體的立場，可能造成同異兩造的意識形態之爭；因而期待一個互爲主體、能夠雙贏的對話歷程。這讓我想起有關於性騷擾的討論。記得有人建議女性在公車上遭到性騷擾的時候，可以一巴掌打回去；在街上遇見暴露狂，可以取笑他的那裡那麼小還敢現；這時候有位女性研究生覺得爲甚麼總是要採取這種男女對立的對抗立場？她建議女性可以說：「先生，請問您貴姓？」讓男人從騷擾情境中跳出，反過來審視自身及其行爲。我想這不失爲一種互動的可能性，就像接到性騷擾電話，故意說沒有聽清楚，要對方再大聲一點重新再說一遍，騷擾者往往就會把電話掛掉。不過採取何種策略，除了當時特定的情境之外，也與個體或群體的社會位置、累積的能量等有關。因爲一個互爲主體的對話，牽涉對話的兩造是否處在稍微平等的位置？否則就像一個遭受婚姻暴力的女性，就算有對話的誠意，但是很難與施暴的先生進行互爲主體的對話。放在當前台灣同性戀的處境脈絡中來看，在台大椰林站的 MOTSS 連線版與異性戀溝通，甚至打筆戰，確有其必要，但是在彩虹夜總會裡尋求認同、累積能量也是非常必須的。

再回到家的意義的主題，余德慧指出殘破家園必然涉及移位。正如雖然我們不歡迎病痛，但一旦疾病來造訪我們，我們除了可以由身體症狀信息中，理解健康問題之外，可能另有深意。容格曾說：「眾神通過疾病來造訪我們」（Northrup, 2000: 5）。經歷疾病是痛苦的，但能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重新意識生命的可貴。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居民除了「站在舊有的基礎悼念殘破」之外，是否也產生新的眼光，一種看待自己與看待世界的新的眼光？〈從環境災害過程中探索家的意義〉一文中，從研究發現與討論裡的各個標題：「自我認同的危機」、「家的意義的倒轉」、「不確定性」等線索來看，確實主要處理了殘破之後的失落，那失落之後的澈念在哪裡？我想絕大部分的居





民在悼念的同時，也就還在追尋一個充滿安全、遮蔽、控制感、認同與親密感的家，尤其是有的男人更加地努力賺錢、期待有事業的第二春，好讓家人能夠趕快擁有一個新的安全的家。當然也有人處在矛盾之中，既期待自有住宅的踏實，又深怕它成爲一個擺脫不掉的枷鎖。

即使是家裡遭小偷都有可能影響家長的自我認同，讓住宅空間從保護人變成需要人來保護的對象（Korosec-Serfaty & Bollit, 1986）。住宅輻射與山坡地災變更是改變了許多居民的人生際遇。一位中小企業的老闆變成台灣反輻射的先鋒；一位街頭市場的小販變成帶領居民抗爭的意見領袖。這位帶領林肯大郡部分居民抗爭的代表之一，從來沒有想過她如今會和許多立法委員、大學教授打交道、做朋友。當初她省吃儉用買了林肯大郡的房子，一夜之間卻頓成無法居住的空殼。爲了爭一個理，她投身於抗爭運動之中。她重頭開始學電腦打字文書處理，在經驗中學習，到後來能夠勝任寫記者會新聞稿、寫陳情書、與政府代表周旋、在媒體鏡頭前侃侃而談。生活世界改變了，她也發現了自己過去所不曾想過的自我能量與可能性。在抗爭的過程中，一方面他們才真能理解過去在媒體上看到的街頭運動者的心理處境，一方面也質疑過去認爲在安定的政府下努力就有收穫的價值觀。如今他們不只是爲了自身的公理、權益而抗爭，更積極的串連台灣山坡地建築社區，彼此交換訊息、形成集結力量。而九二一地震發生之後，他們的抗爭經驗更成爲同爲災民的地震受害居民學習的目標。

「環境災害」一文從住宅的破壞來理解日常生活中家如何成爲安全、情感與自我的匯集之處；相反地，「男同志」與「女性遊民」二篇論文則企圖從社會邊緣的位置來戳破我們對於異性戀父權核心家庭的意識形態想像，並提出另類家庭組成與另類家庭空間居住形式的可能性。過去有關與家庭與婚姻的研究，過於強調家的功能與規範性意義，然而從女性與同志的角度可以挑戰我們認爲理所當然的家庭神話，這樣的研究雖然未必提出取代的對策，但是可以讓我們更加看清楚家庭的實際運作，而以更務實的態度來面對它。

（2001年2月13日收件，作者爲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及本刊編輯委員，「家的意義」專題主編，〈從環境災害過程中探索家的意義：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個案分析〉、〈男同志同居伴侶的住宅空間體驗：四個個案〉二文作者）

## 註釋

- (1)事實上，吳瑾嫻雖主張女性遊民應擺脫家的迷思，卻不反對家的理想形態的建構(頁111)。
- (2)雖然王應棠指出海德格對此在/在世存有者(Dasein)本質的界說是可以變動的，但仍然是一種本質論。對海德格而言，這種本質(或說真理)是先在的，是在世存有者透過主動選擇而讓其「開顯」的。
- (3)華梵大學建築學系自創系以來即在思索著既成設計等教育受到依賴現代性扭曲的情形，因而重新構思了一套以身體—心理主體為中心的基礎建築設計教育課程(蕭百興, 2000b)。在這個強調化體驗為藝術創作衝動、為知識、甚至為審美基礎的課程中，大一的學生首先必須以自己身體為中心演練對校園中某處自然基地的體驗、並以多視角透視圖的方式將其再現出來；其次，則必須將自己放置在諸如浴廁等建成空間之中，除仔細觀察生活使用與空間尺度、結構等的互動關係外，並須將其具體地呈現為模式分析圖的建構；第一學期最後一個操演則是兒時記憶空間。在這個學生以現在的我對過去十歲前的我進行田野訪談的操演中，學生必須學習透過「回憶」去建構兒時的異質地方，除指出其品質、象徵與主體間透過身體、語言等所發生的複雜作用外，還須分析空間形成的社會基礎，並賦予其意義；下學期第一個題目則將操作的現場拉至學校所在的石碇等場景，以實際的田野調查對特定群類的主體進行生活暨空間影像的紀錄，除了訓練學生藉由田野訪談面對現實、釐清現實的勇氣外，還初步探討了空間議題形成的邏輯(蕭百興, 2000c; 蕭百興、施長安, 2000)。當然了，整個課程訓練對身體的重視還是存在的，學生在課堂上還須模擬受訪者的身體，配合其空間性處境編成舞劇在課堂上進行展演；最後，則是菁英美學文化形式的訓練，主要讓學生透過對特定藝術家的論述分析，將寫詩以及造型創作等不同的語彙進行轉化，並傳喚出形式對特殊品味、象徵所具有的多義閱讀作用。
- (4)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中王氏已然注意到語言作為一種空間表徵對家園建構的重要特質。但似可進一步探討奧威尼以漢語而非魯凱語寫作對空間表徵、乃至家園建構所將產生的影響。
- (5)夏鑄九指出：資本主義並非從過去就是「全球經濟」，而是經由一九七〇年代末以來將近二十年的再結構過程、而到今天方才形成的。其指涉了：「經濟在整個地球尺度上，在真實的時間中，作用為一個單位(這不只是國際貿易而是多國、生產、流動、交換之組織)。這就是說，資本流動、勞動市場、期貨商品市場、資訊、原料、管理與組織都超越了國與國之間的界線，以及整個地球都完全相互依賴著，然

而，這種依賴關係卻是以一種不對稱的形式建構起來，全地球不同區域以一種不均等的方式整合起來。經濟系統的主要功能是完全地國際化以及在日常的基礎上相互依賴著，但是許多其他部分，依其功能、國家與區域，卻是片斷化以及不均等地被結構著。所以，全球經濟涵蓋全地球，但卻不針對地球上所有的區域與所有的人民作用。雖然所有支配性的經濟與政治中心是整合在全球經濟網絡之中，而事實上，卻僅有少數人是真正地整合在全球經濟之中，並享有權力。於是社會就表現其自身，將其矛盾與衝突辯證地表現在城市的空間模式之中」（夏鑄九，1995：60）。

(6) Glaser 與 Strauss (1967；Strauss & Corbin, 1990) 在六〇年代發現社會科學的學生在學校裡學習如何掌握大理論，並且嘗試在小的研究領域裡加以測試，但是卻極少對整個理論加以質疑，例如理論的位置及產生的過程。所謂的大理論家扮演「理論資本家」的角色，而其他研究者只不過是「普羅測試者」。理論家訓練年輕的社會學家如何測試大理論，卻不訓練他們如何模仿以建構新的理論。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除了博士論文之外，就很少真正創建新理論，將大半生的經歷都花在測試別人的理論。因此我們需要一套從資料建立理論的方法，亦即一個和驗證理論一樣嚴謹的方法來建構理論。

紮根理論強調資料蒐集和分析是並行、來回循環、而非線性的過程，研究並非從一個很清楚的理論或假說開始，而是從資料去發現建構 (construct) 再得到假說。研究採用理論抽樣，亦即在初步觀察蒐集資料之後，會有新的概念浮現，再根據這些概念去尋找下一個樣本。當理論飽和時，就可以停止蒐集資料。資料的分析，從開放編碼 (open coding) 開始，然後將類別與類別之間的關係加以整合，進行主軸編碼 (axial coding)，然後再將研究聚焦，亦即進行選擇性編碼 (selective coding)。

Addison (1989) 同意紮根理論的持續比較法、重視過程性的理論、強調脈絡、資料蒐集與編碼分析無法分割、從資料歸納以建構理論，但是他認為紮根理論仍然採取素樸的實在論 (naïve realism)，以為資料會浮現 (emerge) 基礎社會過程的理論觀點，而這個觀點或概念會與現實 (reality) 有著對應 (correspond) 的關係。Addison 指出研究者不可能是一個價值中立 (value free) 的研究者，資料蒐集並不能自外於研究者，而研究者也不可能客觀地看到真實。雖然紮根理論承認研究者會在研究過程中改變，但是只局限在對於研究田野的學習，而不是檢驗他自己的先前理解。

Lincoln 與 Guba (1985) 提出自然論 (naturalistic inquiry)，認為研究者不應該在研究之先以自身的理論語言來操縱研究結果。他們認為真實是多重、建構、整體的；知者與所知相互影響、無法分割；假說必須置於特定的時間與脈絡中；實體之間相互影響，因與果不能截然劃分；所有的探究都帶有價值立場。有關資料的處理



與分析的部分，他們提出兩個主要的步驟，亦即辨識單元與分類：

1.辨識單元 (unitizing)：單元有二個特質，(1) 啓發性的，指向某種理解或行動。(2) 可以獨立的最小的資料片段，不需要其他資料就可以加以詮釋。資料分析就從這些記錄意義單元的卡片開始。

2.分類：將指涉相同內容的卡片放在一起，發展描述類別性質的規則，使得後來的卡片可以歸到某一類，並使得類別一致。要注意的是，一套類別並非是「唯一」的一套，而只是可以提供「合理」的建構資料的一套類別。其步驟為：一張卡片一張卡片看，是否「看起來像」或「感覺像」屬於同一個類別，加以歸類。有些卡片看起來好像不相關，則先放在「其他」的一堆，先不要丟掉，也許以後會用到。剛開始時，新的類別不斷出現，但是看了五、六十張卡片後，速度就會減緩。給每一個類別一個名字，名字要能抓到其精髓，並很方便掌握。再看看類別是否重疊。類別之內應盡可能同質，而類別之間應盡可能異質。檢查類別之間的關係。遺漏、不完全或不夠好的分類，可以引導繼續的資料蒐集。那甚麼時候該停止呢？當沒有別的資料來源、類別已經飽和、規律浮現、新資料遠離類別的核心時，就可以停止資料蒐集。

Polkinghorne (1989)〈現象學研究方法〉這篇文章中，提到 Van Kaam 與 Giorgi 的資料分析方法。Van Kaam 在他的「感覺受到理解」(really feeling understood) 的經驗的研究中，舉出六個操作的步驟：(1) 將資料分類 (classification) 到類別中；(2) 將上述資料進行語言轉化，以成為較準確的描述用語；(3) 將第 2 步驟所發展的陳述中並非經驗本質 (not inherent) 的部分去掉；(4) 對於經驗的假說辨識與描述。(5) 將上述之假說應用到資料上，加以測試；(6) 上述步驟完成之後，我們才可以說達到效度。Giorgi 則在有關學習經驗的研究中，舉出六個類似步驟分析訪談資料：(1) 將訪談稿全部讀完消化以得到整體 (whole) 的理解；(2) 再把訪談稿讀一遍，然後從心理學的觀點將它分成一些可以傳達獨立意義 (a self-contained meaning) 的單元；(3) 將受訪者的語言轉化成為研究者的語言；(4) 用研究主題 (例如甚麼叫做學習) 來檢查每一個意義單元；(5) 整合意義的單元，完成包括具體情境的特質的描述。(6) 去除情境特殊性，以完成普遍的、超越情境的 (transsituational) 描述。

## 參考文獻

王明智 (2000)：《男同志性別認同的顛覆與移動—從性別弱勢到性別主體·性別論述



- 與容格理論》。輔仁大學心理系，碩士論文。
- 王應棠（2000）：〈家的認同與意義重建：魯凱族好茶的案例〉。《應用心理研究》（台灣），8期，149-169。
- 米復國（1988）：〈台灣的公共住宅政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灣），1卷，2、3期，97-147。
- 余玉眉、田聖方、蔣欣欣（1991）：《質的研究：田野研究法於護理學之應用》。台北：巨流。
- 余德慧（1996）：〈文化心理學的歷史與空間意識〉。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歷史心理學專題研討會」（台北）宣讀之論文。
- 余德慧、徐臨嘉（1994）：〈詮釋中國人的悲怨〉。《本土心理學研究》（台灣），1期，301-329。
- 吳瑾嫣（2000）：〈女性遊民研究：家的另類意涵〉。《應用心理研究》（台灣），8期，83-120。
- 李維倫（2001）：〈族群認識自身：做為文化療癒的本土心理學研究法〉。台灣大學心理學系主辦「第三屆本土心理學研習會：文化、心病、諮商與心理療法」（台北）演講綱要。
- 汪明輝、楊智偉（1999）：〈台灣原住民民族運動的空間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台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台北）宣讀之論文。
- 施植明、蕭百興、陳成章（1996）：《「環境設計與溝通」教材編撰》。教育部八十五會計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執行成果報告，華梵人文科技學院。
- 夏鑄九（1993）：〈一個都市實踐的假說—都市與區域過程中台灣之地方政府與社會〉。收錄於《空間，歷史與社會：論文選 1987-1992》，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337-362。
- 夏鑄九（1995）：〈全球經濟中的台灣城市與社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灣），15期，57-102。
- 夏鑄九（1997）：〈再理論公共空間〉。《城市與設計學報》（台灣），2、3期，63-76。
- 孫大川（1999）：〈原住民文學的困境—黃昏或黎明〉。《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頁142-162。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 孫治本（譯）（1999）：《全球化危機》。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殷鼎（1990）：《理解的命運》。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海德格（1993）：《走向語言之途》。台北：時報文化。



- 畢恆達 (1993):〈物的意義：一個交互論的觀點〉。《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台灣), 7 期, 97-110。
- 畢恆達 (1995):〈生活經驗研究的反省：詮釋學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台灣), 4 期, 224-259。
- 畢恆達 (2000):〈從環境災害過程中探索家的意義：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個案分析〉。《應用心理研究》(台灣), 8 期, 57-82。
- 畢恆達、吳昱廷 (2000):〈男同志同居伴侶的住宅空間體驗：四個個案〉。《應用心理研究》(台灣), 8 期, 121-147。
- 畢恆達、郭一勤 (1999):〈科技神話的夢魘：民生別墅住宅輻射災害的社會心理衝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灣), 35 期, 111-162。
- 許坤榮 (1988):〈台北邊緣地區住宅市場之社會學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灣), 1 卷, 2、3 期, 149-210。
- 黃應貴 (主編) (1993):《人觀、意義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盧建榮 (1997):〈後現代歷史學指南：讓我們重畫國內大學歷史教學的版圖〉。見Keith Jenkins著, 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導讀)。台北：麥田出版公司。
- 蕭百興 (1995):〈「兒時記憶空間」演練作為建築設計基礎認知課程之意義暨其檢討〉。《華梵學報》(台灣), 3 卷, 1 期, 121-146。
- 蕭百興 (1998a):《依賴的現代性—台灣建築學院設計之論述形構(1940 中-1960 末)》。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建築與城鄉組, 博士論文。
- 蕭百興 (1998b):〈斯地降臨!?: 東海神話暨期早期建築設計論述〉。《城市與設計學報》(台灣), 5、6 期, 63-104。
- 蕭百興 (1999):〈來自彼岸的「新」聲—戰後初期「省立工學院(省立成大)」建築設計的論述形構(1940 中-1960 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灣), 33 期, 133-185。
- 蕭百興 (2000a):〈「建築=空間」的系譜考掘：人文深度空間的浮現及其對台灣建築教育的啟發〉。台中：東海大學建築系暨研究所主辦「新世代建築學及方法學術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 蕭百興 (2000b):〈「深度人文空間」的「原點」紮根：建築基礎設計課程的「覺之教育」實踐〉。台北：華梵大學人文教育中心主辦「覺之教育」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 蕭百興 (2000c):〈淑世智慧的在地實踐：華梵建築學系在石碇地方的文化-空間營造〉。新竹：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主辦「大學與社區發展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 蕭百興、施長安 (2000):〈「空間」在社區營造中的重要性：以邊陲石碇為例〉。《北

- 縣文化》(台灣)，64期，4-27。
- 薩林斯 (Sahlins, M.)，王銘銘、胡宗澤 (譯) (1999)：〈何為人類學啟蒙？20世紀的若干教誨〉。《甜蜜的悲哀》，北京：三聯書店，109-141。
- Addison, R. B.(1989). Grounded interpretive research: An investigation of physician socialization. In M. J. Packer & R. B. Addison (Eds.), *Entering the circle: Hermeneutic investigation in psych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39-57.
- Binswanger, L.(1993). Dream and existence. In Keith Hoeller(Ed.), *Dream & Existence*.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 Boesch, E. E.(1991). *Symbolic action theory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Brown, D. S.(1989). Room at the top? Sexism and the star system in architecture. In E. P. Berkeley (Ed.), *Architecture: A place for women*.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237-246.
- Dupuis, A. & Thorns, D. C.(1996). Meanings of home for older home owners. *Housing Studies*, 11(4), 485-501.
- Frampton, K.(1992).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First published 1980;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1985; Third edition 1992)
- Gabor, A.(1995/1997). *Einstein's wife: Work and marriage in the lives of five great twentieth-century women*.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蕭寶森譯，《愛因斯坦的太太：百年來女性的挫敗與建樹》。台北：智庫文化。)
- Geertz, C.(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 Ghirardo, D.(1996). *Architecture after Modernism*.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 Glaser, B. & Strauss, A.(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 Gregory, D.(1994). entry "space" "spatial structure" "spatiality". In R. J. Johnston, D. Gregory & D. M. Smith(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3rd ed.)*.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573-585.
- Harman, L. D.(1988). *The modern stranger: On language and membership*.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eidegger, M.(1969). *Discourse on thinking: A translation of Gelassenheit*, trans. by John M. Anderson and E. Hans Freund. With an intro. by John M. Ander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Heidegger, M.(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 Row, pp. 3-35.
- Hopcke, R. H.(1995). *Persona. Gay men and lesbian: Out of closets, into the street*, Chapter 5. Boston, MA: Shambhala Publication.
- Hull, J. M.(1997/2000). *On sight and insight*. New York: Oneworld. (曾秀鈴譯,《盲人心靈的秘密花園》。台中：晨星。)
- Kockelmans, J. J.(1975). Toward an interpretation or hermeneutic social science.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5(1), 73-96.
- Korošec-Serfaty, P. & Bolitt, D.(1986). Dwell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burgla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6, 329-344.
- Lincoln, Y. S. & Guba, E. G.(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arris, P.(1975). *Loss and Chang*. Garder City, N. Y.: Anchor Books and Doubleday.
- Mishler, E. G.(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orthrup, C.(1998/2000). *Women's bodies, women's wisdom*. New York: Bantam Books. (邱巍、張敏譯,《女人的身體女人的智慧》。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 Polkinghorne, D. E.(1989).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R. S. Valle & S. Halling (Eds.), *Existential-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y: Exploring the breadth of human experience*. New York: Plenum Press, 41-60.
- Reinharz, S.(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tz, A.(1964). The homecomer. In A. Brodersen (Ed.), *Collected papers, Vol. II: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p. 106-119.
- Scott, A. J.(1982). The meaning of social origins of discourse on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 In P. Could & G. Olsson(Eds.),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Pion Limited, 141-156.
- Seamon, D.(ed.)(1993). *Dwelling, Seeing, and Designing: Toward a Phenomenological Ec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oja, Edward W.(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London: Verso.
- Strauss, A. & Corbin, J.(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